

论网络诗歌的民间化审美表征

曹金合

(菏泽学院 文学与传播系, 山东 菏泽 274015)

摘要: 网络诗歌的民间比现实社会受逻辑规则限制的民间更为开放和自由, 这种虚拟的空间由于具有网络无远弗届的匿名性而呈现出狂欢化的审美表征。它采取的诙谐的文化态度和审美形式, 体现出民间反抗中心和权威的智慧, 其于文本中呈现出的形同质异的讽刺性模拟、语境错位的黑色幽默、暗寓解构的嘲讽笑谑, 成为网络民间最典型的审美表征。但网络诗歌的民间具有的极端自由的色彩和藏污纳垢性, 导致诗歌的审美表征从审美到审丑的偏执发展, 由此引起的网络诗歌的热点和争议确实很引人深思。

关键词: 网络诗歌; 民间化; 狂欢化; 讽刺性模拟; 黑色幽默; 嘲讽笑谑

中图分类号:I2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14)06-0080-14

如果从一种整体性的认知角度来看待网络和民间相互纠结的异质同构关系, 不难发现网络实际上提供了比现实社会受逻辑规则限制的民间更为开放和自由的虚拟空间, 不妨称为网络的民间^①。与现实在权力的边缘位置形成的生动活泼、藏污纳垢的民间文化相比, 网络权力约束的进一步淡化造成的泥沙俱下、多元混杂的局面更为明显。相比较而言, 现实的民间文化在官方文化和知识分子文化的等级压迫下, 只能采取诙谐的文化态度和审美形式作为弱者变形抗争的武器; 网络的诙谐可以充分地接纳互联网上提供的中西方的文化质素, 以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 没有中心和权威的压制带来的自由更多地具有狂欢的意味。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说传统的民间诙谐是一种‘被压抑的反抗’, 那么, 网络时代的诙谐则是一种具有西方狂欢节气氛的‘节日歌墟’了。网络作为一个特殊的时空体, 极具开放性, 又极具包容性, 所有的人都可在这里随意来往歇息, 交流谈论, 这里没有中心, 没有制高点, 它是众多中心与边缘的交汇, 它也许将被规范化但决不会体制化。”^{[1]11}这样, 网络提供的自由开放的媒介空间为民间诙谐文化的登台亮相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礼失而求诸野”的儒家文化传统在网络诗歌的诉求之声中得到了有力地体现。传统的礼节风俗、伦理道德、审美观念在现代文明冲击下造成的崩坏和坍塌, 改革过程中手段和目的的错位对人性的戕害和异化, 物质利益的分配不公和制度保障设施的不完善造成的草根阶层的心态不满现象, 都在网民充分运用民间诙谐文化所作的讽刺性模拟的诗歌中得以展示。可以说在网络中, 诗歌

收稿日期: 2014-04-03

基金项目: 山东省教育厅重点课题“网络诗歌研究”(J10WD2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曹金合(1973-), 男, 山东枣庄人, 菏泽学院文学与传播系讲师,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① 网络的民间与现实的民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虚拟性、自由性、匿名性和狂欢性, 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与庙堂相对立的概念, 民间更多地具有淡化权力和等级观念的自由色彩, 正如陈思和所说:“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参见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前言第 12 页; 亦可参阅他发表于《文艺争鸣》1994 年第 1 期的《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和发表于《上海文学》1994 年第 1 期的《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等论文)但与网络的民间比起来, 其自由性的成分和程度还是要大打折扣的, 由此也就形成了网络文学不同于纸质文学的意蕴特质和审美表征。在这方面, 蓝爱国和何学威两教授合著的《网络文学的民间视野》(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 年版)以民间视角和相关理论作为切入网络文学的突破口, 比较全面地阐述了网络文学的民间文化路径、民间生活形态、民间文化主题、民间审美视线及其民间未来, 从而对网络民间的本质含义和美学表征的阐释作出了富有理论创见的开拓, 可供参考。

恢复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贴近生活的优良传统，在现实世界中，备受压抑的情感和欲望都可以借助民间的诙谐文化得到宣泄和缓释，诙谐的审美形态作为一个释放力比多和颠覆等级制的安全阀门，成为网络诗人调节意识与无意识平衡的缓冲器。

其实，将民间看做是一个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相互交杂的藏污纳垢性形态本身就具有一种狂欢的色彩，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整体，它不能采取条分缕析的理性思维和等级制的价值观念作出简单的二元判断。在民间的原生态中，新鲜和陈旧、鲜活和僵化、现代和传统、建构和拆解共生共存的现象，必须放到整体性的视野中来理解，这就带有双面雅努斯神的狂欢表征。特别是在网络与民间结盟之后，进一步打破了民俗性的地理标识，凸显出的“诙谐性则是民间的精神存在方式。笨狸将网络文学的特点归纳为自由灵动和生动幽默，这两个特点正是民间精神存在方式诙谐性的典型表现。诙谐是什么，诙谐就是幽默。滑稽、丑角化、戏谑、夸张的身体姿势和玩笑，俏皮话、猥亵语和嘲讽讥刺。”^{[1]9} 网络诗人在多元化的价值观念相互渗透和影响的语境下，对光怪陆离的现代生活的反映可以抛开理性规则和意识形态观念的制约，充分运用虚拟的狂欢化空间提供的平等的话语权力，采取讽刺性模拟、黑色幽默、笑谑等民间常用的机智话语的形式，为诗歌的艺术表达方式提供新鲜的血液，将民间的诙谐艺术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充分地展示出来，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民间诗语在根性解除了现实等级观念的拘囿之后，充分呈现出原生态的色彩斑斓的一面来，由此也使充分沐浴着民间狂欢恩泽的网络诗歌具有了不同于纸质诗歌的审美形态。

一、形同质异的讽刺性模拟

讽刺性模拟是狂欢化诗学中的比较重要的审美形态，对事物和现象的模拟造成的形同质异的审美特征正是以狂欢作为底蕴的。可以说，“狂欢是其本质，而狂欢式的所有形象和范畴都是合二为一的，都具有双重性，在它们身上结合了对立的、两极的、互相排斥的两种范畴和性质，如诞生与死亡、祝福与诅咒、夸奖与责骂、青年与老年、上与下等等”。^[2] 讽刺性模拟的子本也不例外，在和母本相似的形态内部却孕育着否定性的色彩，肯定与否定、形与神、表与里、内与外相互对立的质素就这样比较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尽管在神态和本质上二者之间有巨大差异，但子本对解构母本之后的建构色彩还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说，讽刺性模拟的本质并不想在打倒的废墟和垃圾的基座上，再建造一座注定遭受唾弃的垃圾城，而是“使制度化的母本不可动摇的美学原则和价值核心沦为空虚，并瓦解了制度化母本的权威结构所赖以建立的话语基础”。^[3] 之后，再对母本的正反两面性重新予以关照。网络的迅捷性、普泛性、交互性为诗歌的戏仿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养料，让重视诗歌介入功能的诗人，在对社会不尽如人意的现象进行揭露与批判的模拟时从不缺少母本，并让有感而发的诗人在母本灵感的触发下迅疾地敷衍成篇，并在其他网民跟帖参与的互动过程中，体会草根阶层的狂欢所带来的审美愉悦。

这种模拟在诗歌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歌词的戏仿表达对社会反常现象的不满和讽刺。作为一种“仿拟”和“互文性”的审美形态，模仿歌词确实“包含了不甚恭维，不太严肃的成分，有开玩笑、戏谑、逗哏、调侃的性质。”^[4]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诗歌讽刺性模拟歌词的形式和格调的时候，一般抱着一种亵渎的心态，在对高雅、神圣的情感脱冕的同时，对丑的事物和现象的戏拟持有调侃和认真的双重态度。如小虫模仿任贤齐唱的《心太软》写的诗歌《腿太软》，母本表现了现代社会中单相思的痴情对一个人内心的伤害，“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的辩证关系，包含的难以排解的孤独和忧伤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歌词所表现的情感的优美细腻感染了无数失恋的都市浪子。但子本的模仿在颠覆原文本的情感和思想的时候，就使单一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形态呈现出狂欢般的复合色彩：“你总是腿太软 腿太软/空自一堆人和球到前场/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杯/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腿太软 腿太软/把所有体力都

耗在上半场/领先当然简单 想赢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摹本中对中国足球队爱恨交织的感情、希望与失望交替的心态、鼓励与嘲讽交错的态度,都超越了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而成为矛盾的混合体。特别是“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两句,表面的否定失望和内在的肯定期望形成的双面神的审美形态,确实体现了狂欢的精神。这样的模拟歌词的做法借助网络形成的人脉效应刺激了众多诗人的灵感,讽刺性模拟的网络诗歌遂成为不可忽视的诗歌现象。如模拟歌词《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有中国足球版和南宫逸云的CS版,《最近比较烦》则产生了对政治调侃意味的《克林顿比较烦》,《吉祥三宝》有日本篇、食堂版、搞笑小偷版、馒头无极版,此外还有《冰雨》小偷版,《双截棍》CS搞笑版,《大长今》搞笑版,新编《十五的月亮》,模仿《老鼠爱大米》的《老鼠恨猫咪》等等。母本和子本在诗歌节奏、韵律方面的相似之中却包蕴着价值观念和评判标准的巨大差别,而且能在网络上形成不同的版本相互流传,这显然只有在网络时代才能做得到。

二是对具有自身独特艺术风格的成名诗人的诗歌戏仿,也就是说,名人效应形成的艺术光环如果和自己发表的网络诗歌构成了名不副实关系的,名人的光环就会作为众多网民为达到狂欢的目的而故意恶搞和戏仿的目标。可以说,讽刺性模拟在网络诗歌中大行其道,是与网络载体众声喧哗的氛围形成的类似嘉年华会上的喧嚣有密切的关系。这种狂欢的生命感受借名人的诗歌为由头,可以产生解构与建构、否定与肯定之类的双重性的审美效果。正如巴赫金所说:“讽刺摹拟是同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紧密联系着的。讽刺性的模拟,意味着塑造一个脱冕的同貌人,意味着那个‘翻了个的世界’。因此讽刺性模拟具有两重性。”^[5]简而言之,对母本的讽刺性模拟意味着在艺术形式的相似之外,却必须有在内涵上的本质差异,只有在形和神的巨大反差形成的审美张力中,才能借助于“脱冕的同貌人”的形式,将诗歌母本的悖谬、含混或矛盾之处进一步凸显出来。网上沸沸扬扬的“梨花体”^①和“羊羔体”^②诗歌的泛滥成灾,以致酿成影响深远的诗歌事件,一方面与网络本身具有的狂欢化特点有密切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子本对母本的讽刺性模拟,将母本的缺陷和不足进一步凸显,其所产生的“光晕”效应,与对草根阶层的心理刺激有关。

本来,赵丽华的《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我发誓从现在开始不搭理你了》《我终于在一棵树下发现》《傻瓜灯——我坚决不能容忍》《我爱你的寂寞如同你爱我的孤独》等浅白直露的诗歌只是个人博客中的游戏之作,并没有在公开的诗坛上发表的念想。但博客毕竟不是一个人私密的抽屉,可以在无人所知的田地里无所顾忌地放纵自己。当网友浏览她的博客,发现这些只是把一个长句子切断形成的分行诗歌,只要学会按回车键就可以了,诗歌含蓄隽永的韵味、起伏消长的内在律和外在律、抑扬顿挫的节奏等最基本的特征,都被散文的散漫无序和明白如话的审美特点代替了。而且这种简单的小儿科的艺术探索,与其“著名女诗人,国家一级作家,《诗选刊》主任编辑”的身份形成的巨大落差,这就成为网友借助民间的诙谐文化亵渎贬低的狂欢对象。以《一个人来到田纳西》为例,不难看出讽刺性模拟的调侃和解构的否定美学特征。这首简短的诗歌是对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森《田纳西的坛子》的戏仿,“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

① “梨花体”诗歌的泛滥成灾并酝酿成为一个网络诗歌事件,充分显示了网络传媒中的暴力倾向。因为赵丽华在博客中的随笔涂鸦是带有自娱自乐的游戏色彩的,但这种个人化、私密化的行为方式在网络所提供的无远弗届的赛博空间中就转变成为公共空间的众声喧哗。其中具有的名人效应(她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曾担任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评委,兼任《诗选刊》社编辑部主任)自然而然成为网络炒作的热点和噱头,自2006年8月以后,网络上出现了“恶搞”赵丽华的“赵丽华诗歌事件”,网友以嘲笑的心态仿写了大量的口语诗歌,更有好事者取“赵丽华”名字谐音成立“梨花教”,封其为“教主”;文坛也出现了“反赵派”和“挺赵派”,引起诗坛纷争。

② “羊羔体”诗歌成为网络的事件并引发争议,和“梨花体”的产生既有相同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他们都拥有政治权利、文化权利和话语权力的名人身份(二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车延高的武汉市纪委书记的身份更多地具有政治官员的色彩,赵丽华更具有文化官员的意味);不同之处在于车延高的“羊羔体”诗歌是通过公开评奖的方式进入公众的视野,他的诗歌《向往温暖》出现在2010年10月19日晚上7点公布的“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上。采用所谓的零度抒情的直白叙事直接挑战了诗歌意蕴的最基本的底线,这种直白到几乎不像诗歌的“口水诗”被网友戏称为“羊羔体”(取“延高”的谐音)。

是全天下/最好吃的”,对自身厨艺的自信展示抛弃了诗艺约定俗成的审美惯例,自然引起网友怀着恶作剧的心态对这首诗的戏仿,《一个人来到厕所》写道:“毫无疑问/我拉的屎/是全天下/最臭的”,《一个人来到茅房》也一样恶搞:“毫无疑问 /我的大便/ 是全天下/ 最新鲜的”。臭不可闻的大便对美味可口的馅饼的解构是显而易见的,在诗句的格式和节奏几乎完全一致的形式下,对母本诗歌的艺术缺陷进一步放大的目的昭然若揭。这样,就在调侃的态度中树立起此路不通的警示牌,审丑的意象反其道而行之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解构母本的美学标准和价值观念,而且包含的反思回顾之后建构新的美学形态的思想意识,也就具有了讽刺性模拟的双重特性。此外,树袋熊的世界的《妈妈的一天》对赵丽华的《我爱你的寂寞如同你爱我的孤独》的戏拟也可作如是观,刻意表现平庸的日常生活的大白话,也是对“形式是诗的,内容是散文”的诗歌观念极端发展的警醒。

对于“羊羔体”诗歌的戏仿,显然与作者车延高武汉市纪委书记的官员身份、“中国十佳诗人”称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桂冠有密切的关系。他用零度抒情力求客观自然地描绘万千世态的白话诗歌,进一步发展了“梨花体”的口水诗歌的缺陷,受到网友的戏仿也是情有可原的。其实,引起争议的诗歌《徐帆》只是他的博客中的个人试验品,在获奖的诗集《向往温暖》中也没有收录,但网络的强大搜索能力和功能让个人的小秘密迅速进入公众视野,在诗歌的狂欢语境中制造一个个热点的事件。如果说《徐帆》还是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对日常生活的流水账细致地描摹与刻画:“徐帆的漂亮是纯女人的漂亮/我一直想见她,至今未了心愿/其实小时候我和她住得特近/一墙之隔/她家住在西商跑马场那边,我家/住在西商跑马场这边/后来她红了,夫唱妇随/拍了很多叫好又叫座的片子”,那么,网民戏拟的诗歌显然要在形式的相似中保持一种油滑和戏弄的审美心态:“李一帆的帅气是纯爷们的帅气/我一直想见他,至今未了心愿……/后来他撞人了,红了/还喊了句‘我爸爸是李刚’。”最后一句网络用语实际上就是对官员身份的质疑,诗歌与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通过戏仿的审美形态得到了隐晦曲折的表达,其肯定语气中暗含的否定色彩正是讽刺性模拟典型的审美表征。

二、语境错位的黑色幽默

荒诞性的黑色幽默背后蕴涵的悲剧实质与表面的狂欢化的喜剧色彩构成的语境错位,造就网络诗歌对不如意的现实进行干预,却找不到恰当的切入点介入,只好在苦难的深渊中采取“泛乐观主义”形态的审美表征。网络诗歌在狂欢化的审美形态中对黑色幽默情有独钟,这与它本身具有的正反两极的异质因素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的矛盾关系有关。说到底,“黑色幽默是一种把痛苦与欢笑、荒谬的事实与平静得不相称的反应、残忍与柔情并列在一起的喜剧。”^[6]悲剧与喜剧、荒谬与理性、激动与平静、愤怒与柔情都是黑色幽默必不可少的构成因子,任何一方都不能占据核心地位,形成一元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对另一方发号施令,这样就以狂欢的审美态度和价值判断对传统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构成了挑战。另外,从现实生活游戏的姿态也不难发现黑色幽默和狂欢之间的内在联系:“黑色幽默不一定要设定‘正确的一边’与‘错误的一边’,黑色幽默是人类超越窘境的一种无奈的态度,黑色幽默叙述者或人物有时不但是平静的,而且能够在苦难中寻找、发现乐趣,黑色幽默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也传达着叙述者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观念。”^[7]由此可见,黑色幽默作为一种对待生活不幸和苦难的生存态度,实际上是采取反逻辑的思维方式,从反常的现象中看出正常,从无法逗人一笑的地方自我解嘲,从苦难的深渊中发现诗意,这与狂欢节中半现实半游戏的感性审美形态有异曲同工之处。狂欢节上的弱者的笑声往往是在喜剧的形式中饱含着浓浓的悲剧氛围,在一种冷幽默或者黑色幽默的色调中表达着对生存现实的荒诞、虚无的感受。当然,有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与主流的思想蕴涵有比较大的差距,因此借助网络诗歌的形式,可以把纸质诗歌在严格审查制度下无法发表的东西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传播开来,由

此,与纸质诗歌相比,网络诗歌形成了对现实生活给予干预的另一种景观。

在网络诗歌中,弱者的带有讽刺意味的笑声并不是犬儒主义意味的屈从和俯就,与纸质诗歌在维护现存制度的前提下,对改革中出现的不如意的现象所作的嘲讽相比,具有黑色幽默色彩的网络诗歌更直露地表现出不妥协的反抗精神,更多地秉承了民间诙谐文化正义气质的精神底蕴:“这在民间常常表现为对统治者、权势者、财主的讽刺挖苦和作弄,包含有较强的阶级正义和伦理正义色彩。”^{[1][10]}狂欢的网络空间确实也为表现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比异质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对等级制的颠覆和消解凸显的是理性遮掩下的逻辑悖谬,在喜剧的外表下,语境错位的感受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逻辑策略就具有了黑色幽默的形态。^① 在这一目标的实现方式中,视角及其置换不仅仅是观察事物的一种方式,而且还是一个典型的价值批判态度,比如徐乡愁的诗歌《我倒立》,实际上就是运用民间诙谐文化中的颠倒视角来观察常态的事物和现象。当诗人运用倒立的视角对官方宣传的真理和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观察之时,黑色幽默的味道就油然而生:“我还看见主人给保姆倒茶 / 富人向穷人乞讨 / 上级给下级递烟 / 雷锋同志向我们学习 / 看见局长给司机开车 / 当官儿的给老百姓送礼 / 且对前来视察工作的群众 / 夹道欢迎 / 从此以后人民可以当家作主 / 并打着国家的旗号 / 骑在公仆的头上作威作福”。这首诗,通过逆反的思维、反常的逻辑、机智的趣味、虚拟的情景等诙谐的本体形式的巧妙组合,将对现实生活中不可跨越的等级观念,重新颠倒之后的荒谬可笑之处作了淋漓尽致地描绘,暴露出的平等意识的匮乏确实引人深思。

巴赫金曾指出:“其实在上千年里人民一直在利用节日诙谐形象的权利和自由,去表达自己深刻的批判态度,自己对官方真理的不信任和自己更好的愿望跟意向。”^{[8][312]} 对宏观政治渗透并压制民间生动活泼的生活形态的现象,网络诗歌通过富有民间智慧和诙谐的文化色彩的黑色幽默展现了出来。轩辕轼轲的《白居易》显然是采用拆字的艺术技巧与熟知传统文化的网友的审美期待视野开了个玩笑,但嬉笑调侃中的悲剧色彩却呼之欲出:“白居比安居工程划算,但不易/好像吉普赛人那样迁徙/跳起土风舞,披着大围巾/从子宫跑到产房,从故乡跑到异乡”。安居工程的变形走样无法解决弱势群体的生活条件的现象得到了鲜明地展示,为了生存四处漂泊的无奈却用“白居比安居工程划算”的黑色幽默来安慰,体现了王夫之《姜斋诗话》所说的“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的审美效果。同样,黑色幽默中的对立两极相互纠结的矛盾冲突,预示了西西弗斯的悲剧命运在每一个蜗居人的身上重演:“下西洋,找不到钻进地洞的侄子/下地狱,遇不到熬成婆的但丁/小媳妇自有小媳妇的命/昨夜是花烛,今夜可能是花圈/那一刻是洞房,这一刻可能是牢房/就算广阔的刑场又能怎样/蜗居在自己身体里太久太久了/需要脑袋搬家,把血喷到找不到方向”。在这里,狂欢思维通过不确定的语言形式,对君临一切的绝对理念的颠覆,征用的是民间诙谐文化二者并存的智慧,花烛与花圈、洞房与牢房看似风牛马不相及的事物却在咫尺之间,

^① 黑色幽默作为一个文学思潮和流派的形成与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有密切的关系,作为扛鼎之作,它对美国战后人们的精神危机作了形象化的概括和反映。其主要特点是面对特定历史时期无法改变的社会现实和强大的政治压力造成的生活悲剧,以充满荒诞、滑稽和悖论色彩的艺术处理方式呈现出喜剧性的反讽效果。这种将悲剧性的现实作幽默色彩的喜剧化的艺术呈现的目的,是为了对不合理社会发出强有力的控诉,在貌似悖论的语境中发出的含泪的笑声就是对荒谬的非理性社会的抗争武器。对黑色幽默的审美特征和流派风格的了解可参阅《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刊发的梁洪兰《黑色幽默文学的艺术风格》;《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刊发的付卉《从心理空间理论看美国文学的黑色幽默——以〈第二十二条军规〉为例》等论文。具体到中国的国情而言,虽然和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体制和制度方面有比较大的差异,但在中国面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权力寻租现象,凸显的冠冕堂皇的宏大口实与色情化和金钱化的渺小鄙俗的欲望表征之间巨大的反差;工具理性的无限膨胀造成的审美感性的极力萎缩,由此产生的对人性的偏执发展与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全面、健康、和谐的人性内涵的不相吻合等诸如此类的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时有发生。尽管这些都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的不可避免的个别现象,但对立的两极之间的异质性造成的带有喜剧色彩的悲剧,无疑也具有比较浓郁的黑色幽默色彩。在纸质的文本和现实的公共空间中,由于受到传统道德、政治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力与束缚,人们不能把自己生活中感受到的不公正的情绪尽情宣泄,于是在网络中,借助于网络的自由性和匿名性,就可以把草根阶层的愤懑和不满借助黑色幽默的诗句表达出来。这也是为什么网络诗歌中富有狂欢化色彩的诗歌,在对权力的质疑中总是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原因。

“以狂欢的思维结构颠覆了常规的思维结构,瓦解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一元权威,而语言的意义却在破坏中获得了新生。”^[9]这种语境错位导致语言的意义在反常规中获得新生的现象,也是狂欢化的思维所关注的目标。在诗歌模拟的对话交流的过程中出现的悖论意义,在轩辕轼轲的诗歌中也有明显地体现,他的《是××总会××的》将不同语境中出现的性质互异的话语蕴涵,放到共时态的平台上,从而就呈现出了黑色幽默的色彩:“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是玫瑰总会开花的/是骏马总会奔驰的/是天才总会成材的/是龙种总会登基的”,这种“是××总会××的”的话语表述方式是一种典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话语模式。作为教育者总是采用事物的光彩的先进的一面作为激励的典型,用对象本身的正能量感化和教育下一代,它以真理在握的不容置疑的语气,显示出权力话语的威严和强势。而现实恰恰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将老师的箴言化为了泡影:“金子已经变成了废铜/玫瑰已经变成了枯草/骏马已经变成了病驴/天才已经变成了蠢材/龙种险些沦为了乞丐”,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形成的狂欢语境显然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是活人,总会死掉的”就是这种黑色幽默的狂欢思维所展示的思想智慧。

网络诗歌对宏观政治的讽刺和批判所表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确实呈现出异质的色彩,语境错位形成的信息发出者与接受者之间的理解差异,确实造成了狂欢化的氛围。这种审美形态的形成,显然与民间的传统积淀和渊源走势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10]也就是说,几千年来风云变幻、权势话语的沦落与挤压、政治形态的更替变迁并没有对民间的原始生命力造成太大的影响,民间以自己独有的方式保持着自由自在的本性和生动活泼的艺术品格,这是狂欢化的审美形态在网络诗歌中大行其道的动力基础,也是黑色幽默对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巧妙抗争的前提条件。从微观政治对人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影响来看,权力无孔不入的微观存在形态显然更具有持久的影响力。网络诗歌将对它的表现引入到吃喝拉撒的凡俗生活领域,将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矛盾纠葛和在权力干预下出现的非人道现象,用黑色幽默的艺术形态充分地展示了出来。赵思运的诗歌《花妮》是对菏泽火车站发生的真实事件的非实验性虚构,在关注弱势群体的所谓底层写作中,选取旁观视角和客观冷静的心态,对现实生活逼真描摹,其目的就是为了凸显民间原生态的诙谐文化的面貌。在对生存艰难的调侃中,包蕴的屋漏偏遭连阴雨的命运打击震撼人心:“花妮的丈夫是个瘫子/花妮今年春天下岗了/花妮买了个三轮车/今天第一天/跑了一天没有拉着一个客/到了晚上12点/南华火车站/花妮一车拉了四个/拉着拉着/四个人把花妮拉进了荒地/天亮到家/瘫子问挣钱了吗/花妮说/一下子挣了四个人的钱/日他妈的/累死了”。简单的情景模拟和对话场面的描绘造成的语境错位的现象十分明显,丈夫关心的挣钱与妻子被轮奸后所说的“一下子挣了四个人的钱”显然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的错位对话,信息的编码和解码的歧义性,是诗歌形成黑色幽默的审美效果所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轻与重、闲与累、喜与悲、爱与恨的矛盾纠结,都在喜剧的外衣下遮掩了起来,这体现了深受民间诙谐文化浸染的“泛乐观主义”的喜剧化人生态度。“从民间的角度看,喜剧化人生却正是生活的真谛,用幽默的眼光看人生,人生才能充满生生不息的梦想,用笑处理生命,生命才能那样辉煌地展现生命的可贵。”^{[1]10}也许是生活的荒诞对生命的肆意践踏与珍爱生命的坚强人生构成的巨大反差,使生活中处处充满了悲喜剧交错的现象,以至于只要诗人秉承以客观反映现实生活的镜像观念去逼真地描摹,黑色幽默的审美色彩和感悟效果就会油然而生。

中国民间的“乐感文化”^①是在生活的苦难和悲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关照生命的态度，只要诗人对生活进行细致入微的体察，黑色幽默的现象就成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风景。借助网络的自由氛围和对意识形态的屏蔽作用，网络诗歌对反常现象的排列组合造成的荒诞不经的逻辑演绎，在呈现出类似存在主义标举的人与生存环境的对立一面的同时，异质事物的逆反对比也造成了诗歌狂欢化的审美形态。如轩辕轼轲的《孙子兵法》对生活中的二难选择和异质事物的并列安排，就呈现出民间诙谐文化的狂欢色彩：“一张纸不能/既擦嘴，又擦腚/把它撕开就行了/一个女人不能/既当老婆，又当情妇/离婚后再去泡她就行了/一间房子不能/既当卧室，又当太平间/睡着睡着死去就行了”。嘴和腚、老婆和情妇、卧室和太平间等异质事物，在用途上的巨大反差背后的相通之处一经诗人的点化，确实呈现出黑色幽默的形态。可以说，黑色幽默是网络诗歌表现民间对待生活的艰难和困境的一种超越的人生态度，在物质的匮乏造成困窘的生存状态、在不可知的命运玩弄造化的把戏对人的生活肆意捉弄、在无处不在的政治权力对生命和尊严的伤害下，黑色幽默就是从反诗意的处境中寻求出诗意和温情作为坚强地生活下去的润滑剂。格式的《捡垃圾的人》描绘的以捡垃圾为生的我的兄弟，用卖废品的钱“换回一个乡下女人”“供儿子念完了小学”“打发年迈的父亲入土”，他用民间的乐观主义的态度将伤痛和泪水掩埋，苦中作乐的生活态度和处世方式本身就带有诙谐狂欢的味道。令人震惊的是，当“他在垃圾里出没。月色荒凉。/他埋头拯救那些错位的东西。/一个穿蓝制服的人悄悄向他逼近，/夺走了他的秤。他的手在抖，/身体也失去了平衡。他似乎再也抓不住/人们放弃的任何东西。”对错位的东西的拯救，意味着他用以德报怨的态度面对生活的打击和命运的不公，可“一个穿蓝制服的人”对他的行为的粗暴干预将生活的悲剧色彩暴露无遗，纠正错位的事物的行为本身被纠正的荒唐逻辑就是典型的黑色幽默，喜剧和悲剧的反差之大产生的“含泪的笑”的审美效果，非常形象地诠释了狂欢化中的各种审美因素相互纠结的现象。

有时，网络诗歌也采用人和动物对比的方式，表现民间诙谐文化向下看和自我安慰的阿Q精神。在这方面最为人称道的是管见的《小丑》，展示的小丑和猴子的对话，显然与“人是猴子变的”之类的进化论学说无关，也不涉及“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所蕴含的人性双重性的哲学内涵，而是民间困苦生活的黑色幽默展示：“在马戏团/一个小丑/泪流满面/猴子上前/安慰他说/我们活的像人都没哭/你一个搞笑的动物/为何如此/多愁善感”。猴子的像人与小丑的像物不仅触目惊心地呈现出人性的异化，而且人对难以忍受的痛苦的“泪流满面”与猴子对人的安慰“为何如此/多愁善感”的质疑也加强了对比的效果。二者语境的错位是十分明显的，人具有的丰富感情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显著标志，但感情的丰富使敏感的神经加倍地感受到生活痛苦的折磨，二者的恶性循环形成的悖论怪圈就使人陷入了西西弗斯的困境。这时，佯装无知的猴子代替小丑的位置成了狂欢化的重要角色，体现了民间诙谐文化的生存智慧。可以说，网络诗歌对现实生活的介入和表现，以及更少顾忌和更大胆张扬的言说方式，与民间诙谐文化的品性有内在的相通性，二者自由言说和表达对事物和现象的看法的特点，打破了规则和禁忌的界限，形成了对世界新的感受和认识。正如巴赫金所说：“这些大无畏的话语是关于世界、关于权利的无懈可击的、毫无保

^① 由漫长的农耕文明孕育的“经验合理性”的概括提升转化形成的实用理性，为生活在极端简陋困苦的环境中的人提供了产生聚族而居的“乐感文化”的土壤。乐感文化是与“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相对而言的，由于中华民族深受“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伦理观念的熏染，缺少宗教色彩的原罪意识，再加上此岸的艰辛，共同造就了“乐感文化”对民族性格的渗透。就词源学来说，该概念是李泽厚先生于1985年春在一次题为《中国的智慧》讲演中提出的，收录在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李泽厚所著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310-320页；后来在《华夏美学》中他又有所发挥。可以说乐感文化经过“实践理性”和“实用理性”的沉淀过滤，就沉潜在中华民族的无意识深处，成为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种具有原型意味的文化意识在网络诗歌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放大和凸显。也许是网络诗歌较少顾忌的文化心理产生的宣泄心态和抚慰情感起了作用，面对生活中难以忍受的挫折和不可忍受的凌辱，诗歌中都以带有乐观色彩的幽默，巧妙地找到安慰自己的借口，有时甚至用带有狂欢化色彩的语言和言语来自我麻醉。这种体现了乐感文化最本质的精髓的话语方式当然具有自欺欺人的味道，但如果抛弃高高在上的启蒙视角感受草根阶层的悲欢哀乐，就不难发现，这是金字塔的底层受到生活重压的民众摆脱苦难的最有效的方式，其中蕴涵了民间寻求基本的生存之道的绝大智慧。网络诗歌在这方面，作为向世人展示草根阶层的思想情感和生命生活方式的一种比较便捷经济的渠道，体现了比较纯粹的民间文化意识。

留的话语,在几千年里形成的语言。很清楚,这种无畏的、自由的形象语言给予了新世界观以最为丰富的积极内容。”^{[8]312}当用这种“少做作,勿卖弄”的直率语言表现民间诙谐文化的审美特征时,政治文化和民间文化、精英思想和民间意识的代沟造成的语境错位,就会使诗歌的黑色幽默色彩愈发明显。当然,对灾难的乐观态度形成的悲喜剧交互混杂的生活现象,也是网络诗歌用草根视角关照生活、思考命运时,运用黑色幽默最为娴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暗寓解构的嘲讽笑谑

网络诗歌深受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颠覆拆解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后的众神狂欢的现象成为诗歌审美形态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当然对不同的逻各斯权威,由于各自拥有的权力对民间生活的影响和制约的不同,诗歌对权威的颠覆解构也不是毫无顾忌的,而是通过对权威话语或者方针政策、规章制度的摹拟,采取嘲讽笑谑的审美形态区别对待^①。对于僵化的、过时的政治意识形态散落民间之后的权威性,其“架子不倒,内里却空着”的外强中干的实质正是网络诗歌解构的目标和对象。

综观网络诗歌笑谑的对象,毛时代的领袖语录、伟人话语、箴言警句等与新时代的错位造成的笑谑色彩,满足了解构政治权威还原其平凡面目的需要。如赵思运的非虚构实验文本《毛主席语录》(共十二首)采取装置艺术的形式,对毛泽东在大型会议上的讲话、和个别同志的谈话、下面汇报情况时的插话、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等等一字不动地搬进了诗歌,主体介入意识隐蔽的目的是让领袖的话语以本真的面貌呈现出来,正如赵思运所说:“我之所以一字不动,是为了最大程度地还原,还原地越到位,他自身解构的力量就越彻底。我们的精神姿态就越高。”^[11]于是诗人把伟人语录中最具有笑谑色彩的话语精心挑选出来组成装置诗歌,既达到了对伟人话语的脱冕目的,又对现实不如意的生活现状具有了可资借鉴的建构意义。如《上学太累》:“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作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参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毛泽东有关对待学生上课甚至包括逃课的宽容心态的语录,自然具有明显的笑谑味道,本身就是对僵化刻板的教学模式和规章制度的解构,诗歌选取伟人语录的最具有民间色彩的句子,尽管脱离了伟人谈话的语境之后,造成了歪曲原意的现象,但本身的诙谐色彩也构成了对严肃的权威话语的解构,跨语境造成的互文现象也对今天的应试教育的理念形成了解构。同时,在解构的过程中包蕴的建构色彩也是比较明显的,那就是对学生的教育不能采取整齐划一的刻板要求,对性格和素养各异的学生不能统一衡量。正是怀着这样的目的,作者对有关教育的诗歌还写了《要考试就这样考》和《没办法就交白卷》,其中的诗句“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有的考试我就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嘲讽笑谑的意味是很明显的,原始语境与现代语境构成的错位,正是作者为达到彻底解构的目的而采取的技巧和策略。

此外的《鲁迅语录》和蓝蝴蝶紫丁香的《瞿秋白语录》都采取了和《毛主席语录》相类似的笑谑形式,通过对伟人关注形而下生活的低俗形态和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自嘲来解构伟人话语的权威性,这是这类诗歌

^① 笑谑文化作为一种审美形态是民间对官方价值观念和等级意识的反叛的智慧结晶,以物质和肉体的粗俗不堪来对抗官方文化的虚伪高雅,具有比较浓郁的狂欢化色彩。特别是巴赫金,在对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对笑谑文化的民间性特征进行了充分地研究和论述。详情可见他的专著《拉伯雷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具体到网络诗歌,笑谑文化抹平雅俗的鸿沟、颠覆壁垒森严的等级观念、对僵化的政治话语的杀伤力也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正是网络平台让诗歌插上了开拓表现诗歌的题材领域、吸纳民间的各种有益养分、探索诗歌表现的审美空间的翅膀,让在纸质文本中不敢表现也不能表现的另类诗歌浮出历史的地表,呈现出另类的审美表征。

共同的艺术策略。当然,在这些具有实验性质的原创诗歌中,诗人退隐到背景的位置并不意味着就采取了物本主义的客观中性立场,其实,选择伟人的哪些语录进入诗歌本身就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问题。伟人语录先入为主的前理解和诗歌中精心挑选的语句之间的反差,就具有了解构和笑谑的意味。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伟人语录的真理性、神圣性、权威性总是与宏观政治的大是大非的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是根本性的,具有纲领性质的特征和功能;而网络诗歌选取伟人对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所发的感慨,或者是一般的场合中随意的插话,或者是看透造化的把戏之后对自己的质疑和拷问,这样的话语蕴涵就使伟人语录成为一个被解构的名词。而且由于语境的差异,“当我们在自己的讲话里重复我们交谈者的一些话时,仅仅由于换了说话的人,不可避免地定要引起语调的变化:‘他人’的话经我们的嘴说出来,听起来总像是异体物,时常带着讥刺、夸张、挖苦的语调……”^[12]诗人重复伟人的原话产生的笑谑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拿实验体长诗《瞿秋白语录》来说,作为集革命家、政治家、书生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瞿秋白,他说的具有箴言意味的话语可谓多矣,而诗人偏偏看中的是秋白临就义之前写的《多余的话》。瞿的这篇文章作为母本的原义,本身包含了众多相互纠结和含混的异质因素,其对自我的剖析,有无奈、有对人生遭遇的“历史误会”的惋惜,却又有对所持信念的坚定及历史责任的担当,在真实的人文气息中弥漫着一种悲伤。而网络诗人专门摘录符合其解构目的的句子:“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一只羸弱的马》);“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次开会》);“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而且》);“的确/所谓文人/正是/无用的人物”(《的确》);“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从那时候起》);“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永别了》)。这里,诗歌借用瞿秋白对政治生涯的厌倦,以及对个体琐碎的生活趣味的向往,再现了宏大政治对个人的责任要求和个人的爱好趣味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反思,突出瞿秋白的政治身份和文人身份的纠结关系,从而凸显其解构的目的。特别是用中国的豆腐的评价作为长诗的结尾,生命与死亡、决绝与眷恋、厌倦与热情之间的相互对比产生的感叹唏嘘,就具有了既自嘲又嘲人的双重色彩。由此可见,在主客体的相互嘲弄中呈现出的“笑谑”,具有特定语境下的丰富的审美蕴涵。而作为网络诗歌版的子本展现出的“笑谑”,更多地具有后现代主义的色彩和意味。在与母本的差距中,再现了“笑谑”对母本旧价值的剥落与新价值的再造。

巴赫金说:“一切事物都有可被摹拟的地方,亦即自己可笑的方面,因为一切事物无不通过死亡获得新生,得以更新。”^{[8]203}对伟人语录的摹拟形成的笑谑的审美形态也可作如是观,对僵化的旧观念的解构正是为了富有生机活力的新观念的建构。由此可见,民间的思想意识形态虽然深受官方文化的禁锢和影响,但作为弱者也并不是面对强者的威严和控制就完全失去了主体性,特别是官方借助正统观念的权威对民间的叛逆意识进行压制的时候,网络的宽容语境提供的自由言说方式,为诗人创作的以笑谑和解构权威的等级观念为目的的诗歌皴染了狂欢的釉彩。“笑是民间诙谐的生命所在;笑本身意味着亲昵化,它能消严肃,除僵化、刻板,拉近距离,取消等级,促成人们平等的交往;笑是一种非官方的生活”^[13],因此,网络诗歌采用笑谑的形式,剥离领袖讲话的具体语境以造成信息编码和解码之间的错位,其中蕴涵的嘲讽味道就具有鲜明的民间色彩,体现出诙谐文化的正反两面性。一方面,领袖话语具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被诗人“断章取义”式的排列组合的诗句产生的调侃意味所消解;另一方面,伟人的平凡话语包含的哲理意蕴又通过微观政治深入渗透到日常生活的芯子里面,产生了跨越时空的深远影响,这也是为什么诗人对政治权威的挑战总是喜欢拿伟人话语开涮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笑谑却又总是与民间诙谐文化中的崇低化的黄段子、荤笑话等具有情色意味的话语片段有密切的关系,通过神圣与低俗的联姻方式,就可以把崇高的事物身上被人为附加的虚假成分剥离开来,真实的世俗的事物作为一面参照的镜子,对神圣的东西构成了颠覆和消解。如网络诗歌对革命话题的调侃和

解构。革命中包含的红色的政治文化与网络年代灰色的价值观念的错位,造成了诗人借助于网络,展示民间意义上的革命的另一重语义的机会和条件;同时两重革命意义的异质成分的相互对照,形成的笑谑和解构的意味也不容忽视。当然,不同的网络诗人对革命的解构也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也就呈现出不同的笑谑风貌。如伊沙的《北风吹》就把电影白毛女的唱段与观看电影时的生理反应嫁接到一起,“喜儿遭地主强暴”的镜头竟成为我的性启蒙,“证明我已长大/可以接革命的班”。“接革命的班”的内涵的歧义性和含混性就巧妙地构成了对革命的解构,到底是政治意义还是性的意义上的革命,诗歌没有明说。这种异质性的因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现象,确实体现了笑谑解构技巧的艺术魅力。

从主流的价值观念来衡量那些边缘的、异端的带有灰色、黄色、甚至黑色色彩的网络诗歌,其呈现出来的笑谑所具有的解构力度确实比纸质诗歌大很多,具有的正反价值也需要辩证地去看待。其中,对宏大的政治名词包含的某些压抑人性的或者是虚假的成分进行戏谑,并凸显其背后的缺陷和弱点,这种解构是有意义的。如伊沙的《原则》写道:“我身上携带着精神、信仰、灵魂/思想、欲望、怪癖、邪念、狐臭/它们寄生于我身体的家/我必须平等对待我的每一位客人”,把“欲望、怪癖、邪念、狐臭”这些人性的缺点也上升到“精神、信仰、灵魂”的高度,认为它们是人性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用平等的原则来对待,显然具有笑谑的味道。但它具有的积极意义是很明显的,对传统的约定俗成的原则具有的公共、光明、神圣、伟大一面的解构,目的是让原则的个人、私密、丑陋、卑下、阴暗的一面呈现出来,一体两面的原则内涵正是民间狂欢化精神的体现。

其实,民间自由活泼的诙谐文化都具有正反的两面性,笑谑作为诙谐文化的双重性的典型代表,对僵化的、过时的权威的否定和对新鲜的、活泼的事物的肯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这里,网络为拆解过时的宏大的话语名词开辟了第二言论空间,通过笑谑,笼罩在权威周围的神秘光环和散发出来的神圣崇高的威力都被脱冕化了,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成为陪伴大众茶余饭后谈资的亲昵对象。因此,“笑谑具有把对象拉近的非凡力量,它把对象拉进粗鲁交往的领域中……笑谑能消除对事物、对世界的恐惧和尊崇,变事物为亲昵交往的对象。”^[14]从中可见,网络诗歌的笑谑不是只具有单一的价值批判色彩的嘲笑,而是带有狂欢化味道的暗寓解构和建构的双重性。

四、自由的滥用:民间化的审美反思与评判

自由是一柄双刃剑,网络诗歌对自由的误用和滥用使其随时面临着严重的自伤问题——对诗歌之为诗歌的本体特征和审美意蕴的颠覆消解,造成的淡乎寡味、变态发泄式的诗体解放绝不是网络诗歌的福音,更与促使诗歌在深厚的传统基础上进行的改良扯不上边。诗歌作为一个发展比较成熟的文体有自己的本质内核,那就是诗歌在内在律和外在律的起伏消长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诗情、诗美、诗韵、诗式。尽管每一次承载意蕴的媒介的发展嬗变,都对诗歌的美学风貌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媒介的艺术功能只是对诗歌的整体意蕴和审美风貌起一种辅助作用,它不能也永远达不到喧宾夺主的程度,左右和掌控诗歌的本质特征。当下网络诗歌在错误的诗歌理念的指引下形成的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现象,远远超过了一个健康的诗歌环境所称承受的底线,急需借助历时态和共时态形成的比较公认的诗歌准则对其进行审美反思和评判,在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辩证反思中审视其在审美中的变异,必将对促进诗歌的健康发展提供有意义的启发和帮助。

(一)关于网络诗歌的艺术表达形式问题

网络诗歌首先值得反思的是其在形式表达方面对诗歌规则和审美韵味的抛却:它以随意分行的形式割裂诗韵的意味,作为凸显诗歌表征的最重要的因素。本来在所有的文体中,诗歌的形式意味是最为突出的,但诗歌的形式是典型的有意味的形式,这就对诗歌的审美形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古典诗歌讲究

“含不见之意见于言外”、涵咏“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玩味“境生于象外”等的审美要求，同样具有诗歌形式意义的普世价值和评判意义；况且内容和形式密不可分的文艺理念早就成为众所周知的共识。但是，在网络诗歌走向自由的极端发展之途的时候，诗歌门槛的过低也使众多网上冲浪的“准诗人们”早将常识性的诗歌原则抛到了九霄云外。在此不妨拿“梨花教主”赵丽华的那首流传很广的网络诗歌《当你老了》和纸质版的叶芝的同名诗歌做一下比较，二者的相互对比就愈发呈现出诗意抽空之后干瘪的“非诗”的景观。赵的诗歌由四句组成：“当你老了，亲爱的/那时候我也老了/我还能给你什么呢？/如果到现在都没能够给你的话”，非常吻合网络诗歌散文化的极端发展带来的平淡无味的感觉表征，简洁的大白话式的艺术形式加上分行排列的简单组合，却并不能体现诗歌那阅尽人生的沧桑之后精神意蕴的审美要求，况且最后一句采用“如果”式的让步假设本身就含有语义逻辑的错误，诗意的情感表达在现在和未来的时空错位中，并没有呈现出陌生化的处理方式带给诗歌欣赏的审美愉悦，反之，有点虚情假意、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造作之感。对照叶芝的诗歌《当你老了》（袁可嘉译）中的审美意象“柔和的眼神”“浓重的阴影”“欢畅的时辰”“朝圣者的灵魂”“痛苦的皱纹”表达的丰富蕴藉的情感，那种与恋人刻骨铭心的相思之情和忠贞不渝的爱情表征与人的心灵产生的情感契合，那种情感的强烈共鸣产生的震撼灵魂的审美愉悦，是无法用语言文字进行描述的。二者相比，诗歌审美意境的高低、审美情感的浓淡、话语蕴藉的深浅不是立竿见影吗？而车延高的“羊羔体”之所以在网络上引起热议，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其对诗歌底线的挑战超出了人们的阅读期待视野，作者亦不能用所谓的“白话手法”“零度抒情”来为自己回车键式的写作寻求理由。以他的引起争议的诗歌《刘亦菲》所表现的风貌就可窥一斑而见全豹，这首诗就是典型的散文的分行排列：“我和刘亦菲见面很早，那时她还小/读小学三年级/一次她和我女儿一同登台/我手里的摄像机就拍到一个印度小姑娘/天生丽姿……”这种披着诗歌形式的外衣表现的全是没有诗味的白话散文，彻底解构了诗歌的文体特征。至于那等而下之的戏仿之作更是比比皆是，网络诗歌打着诗体大解放的名义而走向了它的反面。因此在网络搭建的自由的平台上，若诗人自以为信笔涂鸦、发泄变态情欲的分行形式就具备了诗歌的特征，实在是大错而特错的事情。

如果对这类失去了诗歌韵味的自由体的原创和戏仿的创作行为进行追根溯源的话，五四时期胡适的矫枉过正的诗歌主张“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15]，显然已将传统的作诗规则（包括格律、韵脚、平仄、字数、行数等），作为陈腐不堪没有任何借鉴价值的“遗形物”毫不吝惜地抛弃掉了；经过“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的第三代诗人对朦胧诗歌的叛逆和践踏，到了网络诗歌这块无人监管的“飞地”的时候，极端发展的自由理念早就在戏仿的狂欢中，将诗歌的评判标准和本体的审美特征抛之脑后。其实，对立的诗歌观念在网络诗歌摘掉诗歌规则束缚的簪头的时候，就在自身内部埋下了物极必反的颠覆自己的种子。网络诗歌的此类热点以及不断引起的质疑和争议的呼声，不仅显示了民间诗歌藏污纳垢的本体特征和鱼龙混杂的多元化审美形态，而且也使人对网络滥用自由而对诗歌的诗质和意蕴造成的伤害深表疑虑，对于那些只是为了呈现口腔快感的诗歌，一旦失去了能指与所指的相互缠绕所形成的意蕴无穷的诗语内涵，仅仅是打破了诗歌文体的规范之后的分行标志能否还算是诗歌？^①由此可见，无论是“梨花体”还是“羊羔体”引起的热议背后，都凸显的是回归诗歌本体的常识性命题：“在诗歌创作中，自由也是相对而言的，不存在绝对自由的诗。”^[16]

^① 其实，无论是“梨花体”还是“羊羔体”的原作和仿作都是对自由诗歌的“自由性”理解偏执的产物。也就是说，自由不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无边的自由，诗歌作为约定俗成的一种文学文体有它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最本质的特征。这种特征不是仅仅表现在外在的形式上的分行排列上，而是其内在的诗韵、诗意、诗情和诗感，诗歌内在律和外在律的起伏消长、相生相克的复杂意蕴才构成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之致。但网络诗歌在充分自由的语境和空间中无所顾忌地放纵自由的权力，甚至把最基本的诗味也给冲淡到了不能觉察的地步，这样诗歌之为诗歌的最基本的内核的颠覆消解之后造成的文体的解体，挑战了读者“前理解”的范围和限度，引起的争议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不过，如果对网络自由体诗产生的恶果进行追根溯源的话，可以说新诗的开拓者胡适在对诗歌的理论主张中采取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为以后诗歌的发展和审美蕴涵的开拓埋下了祸根。特别是他的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的《谈新诗》的主张：“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89页），更是成为做白话诗歌的金科玉律，把诗歌的格律体当作假想敌使“诗”与“歌”分离，割断了延续千年的诗歌的审美特征和创作规律，由此造成了诗歌淡薄无味的“非诗性”肆意蔓延的不良后果。

(二) 关于网络诗歌话语主题的价值生命力思考

从内涵上讲,网络诗歌在历史虚无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的影响下,其与后现代主义价值多元的合谋产生的诗歌恶谑化倾向,尤其是黄段子化中的审美错位与价值扭曲、伦理无底线乃至历史失真的极端发展造成的不良后果,最值得当下警惕与批判。综观网络诗歌民间化的审美表征,以笑谑提供的民间话语解构不合理的宏大话语的积极一面存在被迅速膨胀的恶谑化所代替的危险。诚然,“笑谑仿佛记录这交替的事实,记录旧物死亡与新物诞生的事实。”^[17]但民间的笑谑是一个正经与假正经、理性与非理性相互缠绕、相互融合的一个矛盾异面体,它所具有的狂欢化的双重价值,使得网络诗歌颠覆政治意识形态的时候显得游刃有余,正反两方面的动态平衡保持了对事物解构和建构的特质;但这并不意味着诗人都是在笑谑的平衡范围内积极地建构诗歌的审美形态,有时候恰恰相反,网络提供的太自由的环境,为网络诗歌的笑谑变为只为无厘头搞笑的噱头提供了条件,为搞笑而故意恶俗化的审美形态显然已走向了民间笑谑的反面,它只具有笑谑的表面形态而失去了双面性的积极意义。

从诗歌戏仿的价值意义来说,网络诗歌的讽刺性模拟并不都是以否定的表面形态表达肯定的价值意义,或者是肯定的表象背后暗藏的是否定的实质。也就是说,网络诗歌在异质的组成成分相生相克的过程中,并不总能保持动态的平衡,成为一个整体的矛盾纠合体。特别是浮躁喧嚣的网络环境有时表现的只是狂欢的外形,而失去了狂欢积极的、建构的、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精神实质。比如对“梨花体”的戏仿的“佟湘玉版”:“饿滴神呀/你/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你/真的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其实/我也/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这样的带有大话西游色彩的绕口令只具有了讽刺性模拟的颠覆意义,其颠覆之后的建构却没有呈现出来,这样就陷入了和单一价值的母本同样的地位和水平而不能自拔的埃舍尔怪圈,为游戏而游戏的狂欢化就会如同一柄锋利的双刃剑,在消解他者事物的不合理之处时也会伤及自身,这也是网络诗歌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艺术问题。

不惟如此,网络诗歌的低俗化甚至色情化倾向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网络诗歌充分运用民间笑谑的幽默智慧,对高高在上的神圣之物的嘲讽呈现出浓郁的解构色彩,但这种解构一旦失去真善美的底线则面临着被解构的境遇。如东夷的《祖国啊,祖国》对自我的贬低化的自嘲和色情化意味的比喻,显然有对神圣的祖国的笑谑意味:“祖国啊,祖国/在你的肚子里/我是盲肠,我是胆结石/我是肺结核,肝硬化/我是咽下去的一口痰 /我是祖国的下水/ ……我好色,好中国特色”。诗人故意不把自己当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采取低下的视角,观察神圣之物中被涂抹的崇高的油彩,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崇低姿态进行解构亵渎才显得理直气壮,“我好色,好中国特色”的网络语言的奇葩新解体现了民间笑谑的本质特征。与舒婷的诗歌《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相比,对庄严的国族意识进行解构和反叛的精神是显而易见的。也许是用性话语解构具有阴性色彩的祖国妈妈太得心应手,这种故意用笑谑的形式描绘祖国形象的诗歌,除了满足了亵渎和解构宏大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快感,却已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换句话说,如果网络诗歌只是为了解构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威或者对神圣事物的刻意亵渎、而没有伦理道德底线的时候,就失去了其解构或“革命”的合理性意义。比较典型的有阿斐的《中国》,对中华民族遭受外国列强凌辱的历史缺乏应有的同情心和悲剧感,只为了刻意的力比多狂欢而置基本的道德意识和历史感于不顾,通过对受虐狂形象的塑造,显示出作者为解构而解构的恶谑倾向:“中国很久没达到过高潮了/强忍着性欲一脸懊丧/外国佬以为瘫在地球东方的这块疤/是位被操烂的老妇/于是充满好奇地跑过来……”。不仅每句诗歌都离不开力比多的点缀,无性不成诗的粗俗戏谑只是发展了垃圾派诗歌的弱点并推向了极致,但却对中国作为一个神圣名词的解构起不了作用。也就是说,亵渎和解构都是有伦理底线的,一味地解构和丑化祖国也会遵循物极必反的规律对自身构成了解构。对这种情况,伊沙的《风光无限》将性政治与阶级学说联姻进行的恶俗化解构也具有同样的问题,“老婆不在/大胡子卡尔/扔

掉鹅毛笔/脱去燕尾服/溜进了厨房/把那正削/土豆的女仆/压在地板上/直喘粗气/这算不算/一个阶级/在压迫/另一个阶级”。对于把伟人神圣化的行为不是不可以解构,而是如何解构并还原为一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人物的问题。马克思生前曾十分愤恨资产阶级的作家把他描绘为“脚穿厚底靴,头戴灵光圈”的神人,戏剧家沙叶新也曾在《马克思秘史》中对他进行了还原,目的是呈现马克思作为一个好爸爸、好丈夫、好朋友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本真面目。而这首诗歌借助网络的保护,对马克思的行为和学说进行亵渎的目的只是为了丑化他,无论是妖魔化还是神圣化都是割裂他作为一个人的整体本性的极端形式,都失去了民间诙谐文化应有的艺术光彩。因此,对网络诗歌由笑谑向恶谑转化的倾向,尤其值得反思。

这里,要引以为戒并需要警惕的是,网络的自由性的负面影响在诗人自以为是、无所顾忌的狂欢化的行为中得到了进一步凸显。当然,网络诗歌的恶谑化倾向的极端发展不是空穴来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诗人滥用了网络诗歌的自由空间,再加上后现代主义对传统的神圣、典雅、高贵等正价值的颠覆消解,以及对待千百年来传承和积淀的文明成果的虚无主义的态度,由此最终异化为对形而下的肉体、生殖、粪便等物质的、审丑的一面津津乐道。最先在网络上引起轰动的是由沈浩波、朵渔、尹丽川、巫昂等人发起的下半身诗歌运动,理论宣言是沈浩波起笔的《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以肉体在场的物质性存在建构诗歌的肉体乌托邦,这种将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个体有意采取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强行分为上半身和下半身,形而上和形而下、精神和物质、高雅和粗俗,目的是解放对立的后一项中被压抑的生命力,于是野蛮性感的肉体在场感不仅驱逐了形而上的精神探求,还要去埋葬经典与大师:“哪里还有什么大师,哪里还有什么经典?这两个词都土成什么样子了。不光是我们自己不要幻想成为什么狗屁大师,不要幻想我们的作品成为什么经典,甚至我们根本就别去搭理那些已经变成僵尸的所谓大师、经典。”^[18]这样,割裂了与经典和大师的审美文化的传承,必然会导致没有根基的漂浮之感,颠覆了代代相传的精神文化和审美意蕴的诗歌,还能指望以什么材料建构诗歌的美学大厦?两极中遮蔽审美和崇高而刻意凸显的低俗、审丑的一极,无疑偏离了网络诗歌健康发展的航道,由此引起崇尚“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的不满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可惜的是,诗歌并没有在形而上一极的有力制衡中走上平衡之路,而是在2003年,由皮旦、管党生、管上、小月亮等人发起的垃圾派诗歌运动中继续向审丑的一极狂奔。由他的理论宣言可以看出垃圾派的创作风格和美学风貌:“垃圾派的三原则是,第一原则:崇低、向下,非灵、非肉;第二原则:离合、反常,无体、无用;第三原则:粗糙、放浪,方死、方生。”可见,网络诗歌滥用低俗化的词语对神圣崇高事物的肆意解构是没有伦理底线的,缺少了底线的制衡作用导致的恶谑化倾向确实触目惊心,看一下他们的诗歌文本对祖国和革命导师的恶俗描摹,任何一个稍有良知和基本常识的中国人都难以容忍。

近二十年的网络诗歌的发展,在网络赛博空间的匿名性、自由性和低门槛的生态环境中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是正常的,关键是如何对网络诗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予以解决,努力寻求促使网络诗歌健康或可持续发展的可能途径。对于网络诗歌割裂中外、鄙视古今的极端化写作方式带来的弊端,百年前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的思想观点仍不失为补偏救弊的良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19]也就是说,要保证网络诗歌作为诗歌大家族的一种新兴的文体的蓬勃发展,就不能采取固步自封或夜郎自大的心态,用虚无主义的态度鄙视承传下来的一切优秀的诗歌文化遗产,尤其是对诗歌经典中包蕴的丰富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技巧,要采取拿来主义的开阔胸襟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说,网络诗歌作为诗歌母系统中的一个富有活力的子系统就必然具有整体系统的共性特质,因此,媒介的转换没有必要使网络诗歌采取画地为牢的方式刻意凸显自己的不同风貌,相反,只有采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书写策略,变两极对立为多极和而不同的思维模式,吸纳一些优秀的文化遗产,才能使网络诗歌蓬勃发展的春天早日来临。

参考文献：

- [1] 蓝爱国、何学威. 网络文学的民间视野[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
- [2] 程军. 双面雅努斯神——戏仿的双重性特征分析[J]. 兰州学刊, 2013(4): 86.
- [3] 张阅. 内部的风景[M].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0: 67.
- [4] 刘康. 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166.
- [5] [俄] 巴赫金. 诗学与访谈[M]. 白春仁, 等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167.
- [6] 袁可嘉, 等.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三册(下)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 621.
- [7] 余岱宗. 论余华小说的黑色幽默[J]. 福建论坛: 文史哲版, 1998(3): 47.
- [8] [俄] 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 第六卷[M]. 白春仁, 晓河,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9] 夏忠宪. 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4(5): 74-82.
- [10] 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12.
- [11] 赵思远. 边与缘——新时期诗歌侧论[M].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5: 240.
- [12] [俄] 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 白春仁, 顾亚铃,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267.
- [13] 王建刚. 狂欢诗学——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1: 327.
- [14] [俄] 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 第三卷[M]. 白春仁, 晓河,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526.
- [15] 胡适. 胡适学术文集· 新文学运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389.
- [16] 吕周聚. 被遮蔽的新诗与歌之关系探析[J]. 文学评论, 2014(3): 34.
- [17] [俄] 巴赫金. 文本、对话与人文[M]. 白春仁, 晓河, 等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24.
- [18] 陶东风. 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74-375.
- [19] 鲁迅. 鲁迅全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57.

On the Aesthetic Representation of Network Poetry's Folk Style

CAO Jin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Heze University, Heze, Shandong 274015, China)

Abstract: The virtual space of network poetry enjoys much more openness and freedom than the real society restricted by logical rules. The cyberspace with its anonymity demonstrates a kind of aesthetic carnivals. Its jocular cultural attitude and aesthetic form reveal the folk wisdom against centrality and authority.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 folk style include heterogeneous parody, black humor out of malposed context, and mocking laughter implying deconstructive ridicules. However, the extreme freedom and filth expressed by some network poems sometimes result in paranoid of ugliness, which incurs heated debates.

Key words: network poem; folk style; carnival; parody; black humor; mocking laughter

(责任编辑: 黄仕军)